

安徽省文化精品工程项目

《安徽文化精要》丛书

主编 陆勤毅

安徽宗教

本卷主编 余秉颐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HUI ZONGJIAO

安徽宗教

本卷主编 余秉颐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徽宗教/余秉颐主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8
(《安徽文化精要》丛书)

ISBN 978-7-5396-5251-1

I. ①安… II. ①余… III. ①宗教-介绍-安徽省
IV. ①B9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6755 号



出版人: 朱冬

总策划: 田海明

责任编辑: 张磊

总统筹: 朱寒冬 刘哲

装帧设计: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销部: (0551) 63533889

印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 65859551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00千字

版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总 序

安徽,清康熙六年(1667年)建省,省名取安庆府与徽州府名第一字为“安徽”。

安徽是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繁昌县人字洞发现距今约250万年的人类活动遗址,在和县龙潭洞发掘的距今30至4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和县猿人”遗址,表明远古时期已有人类生息繁衍在安徽这块土地上。在距今7000年的分布于蚌埠、滁州一带的双墩文化发现的刻画符号,在距今6000年的潜山县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文化遗存,不仅支持了华夏先祖在安徽这块土地上持续活动的证据,更为探索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

安徽是中国古代文明发达最早地区之一。距今5000年前后的蒙城尉迟寺和含山凌家滩大型聚落遗址,固镇濉城镇龙山文化晚期城址,蚌埠禹会村大型会盟遗址和怀宁孙家城古城址的发现,使安徽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点区域。从经济发展史上追寻,由大禹治水、会诸侯于涂山,到孙叔敖建芍陂,水利灌溉从萌芽至兴盛,农业从此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由东夷活跃于淮河流域,到楚国迁都寿春,表明古代两淮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已趋于成熟。由曹魏屯田,到两宋修圩田,“江淮熟、天下足”的民谣,传递着古代安徽地区农业经济繁荣的信息。至明清两朝,徽州商帮走四方,芜湖米市润江南,古代安徽农业经济达至鼎盛。从文化嬗变中探究,由淮上老庄创立道家学说,至新安朱熹构建宋代理学,中国文化的灵魂得以延续、升华。由备受推崇的东汉建安文



学,至独树一帜的清代桐城文派,中国文化的表达得以推展、绚丽。由先秦时期淮河流域民歌《周南》《召南》,东汉时期的长篇五言诗《孔雀东南飞》,至清代皖人吴敬梓作《儒林外史》,中国文化的民间土壤得以肥沃、拓展。由商周开始铜陵、南陵一带铜矿的开采和冶炼,至西汉淮南王刘安著作《淮南子》,明清方以智研著《物理小识》,中国文化孕育出的科学精神和技术能力得以发扬、提高。

安徽更是中国近现代文明的先行地区之一。百余年来,近代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出自安庆“工匠”之手;当代中国的“两弹”制造与核物理学家怀宁人邓稼先息息相关。百余年来,安徽人探究现代科技、绘写现代文明的脚步未曾停止。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开风气之先,引领近代思想狂飙突进;肥西小井庄、凤阳小岗村的农民解放思想,大胆突破旧体制的束缚,掀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百余年来,现代文明和思想文化登上殿堂,走向大众,普惠城乡。清廷重臣合肥人李鸿章在混沌乱世另辟洋务运动,当代安徽敞开胸襟与世界沟通交流。百余年来,安徽与世界的空间距离未变,心理隔膜却日趋淡消,越来越多的安徽人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现代文明已经融入安徽社会,俨然成为安徽文化的主干。

这就是与时俱进的安徽文化,这就是安徽文化的神奇和魅力。

我长期在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2009年奉调安徽省社科院工作,正值安徽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若干意见》。安徽省社科院作为全省唯一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拥有各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理所当然地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建设文化强省”的实践。由此,我与社科院有关同志商议,组织编写、出版《安徽文化精要》丛书,一是使社科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与“建设文化强省”相结合,使研究成果能够更贴近社会、贴近人民大众;二是努力传播连绵不断的安徽文化,扩大安徽文化的影响力,丰富人们的文化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

《安徽文化精要》丛书按事类、学科分卷编写,独具安徽特征。对在

全国产生重大影响或起先导作用的事件、事物,亦单列成卷。丛书计划编写 26 卷,包括《安徽哲学》《安徽考古》《安徽经济》《安徽历史》《安徽宗教》《安徽建筑》《安徽戏曲》《安徽诗歌》《安徽散文小说》《安徽美术》《安徽教育》《安徽科学技术》《安徽文化产业》《安徽农村改革》《安徽传媒》《安徽风景名胜》《安徽民俗》《安徽名城》《安徽名镇名村》《安徽中医中药》《安徽人口姓氏》《安徽学术》《安徽体育》《徽学》《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徽民间工艺》等。丛书分辑组织编写、出版,每辑 5 至 7 卷,每年出版一辑,计划 5 年内完成丛书编写、出版。丛书取名“精要”,意在以严谨求实的学风,通俗易懂的语言,明快精当的叙述,把安徽文化中基本的、精华的内容,图文并茂地介绍给广大读者。

《安徽文化精要》丛书,得以按计划顺利出版是各卷主编带领作者们不辞辛苦,倾心治学的结果,我和编委会的各位同人只是尽了组织和督促之责,在此一并说明,以免贪功之嫌。

《安徽文化精要》丛书得到安徽省文化精品工程专项资金的资助,得到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向他们表示诚挚谢意!

陆勤毅

2010 年 12 月序

2012 年 5 月修改

引言

基于悠久厚重的文化传承,作为地域文化一个部分的安徽宗教亦是源远流长。考古出土资料证实,五千多年前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安徽先人就具有高度发达的神权意识与宗教意识。在现代意义上,宗教指的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即宗教是具备信仰的观念、体验、行为与体制这四个要素的社会文化体系。在我国,具体而言指的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我们介绍安徽宗教,也是就上述宗教展开。

与华夏文明发展进程相一致,安徽地区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出现于两汉之际,以佛教与道教为核心与主体。这里,我们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中国佛道宗教的发展过程,为我们理解安徽宗教提供一个恰当的背景。

先说佛教。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是为佛教初传中国的可靠记载。此后,经历漫长过程,终于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并发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形成既有外来文化特色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在中国有三个分支,其一是“云南上座部佛教”,分布在云南与缅甸、老挝接壤的地区,带有云南边疆民族文化特色;其二是“藏传佛教”,在藏语地区传播,后来扩展到西藏以外如云南、四川、甘肃、蒙古等地;流行地区最广,信众最多,并由中国内地传入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是为“汉传佛教”。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中国佛教即是就汉传佛教而言的。

汉传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相结合,凭借中印两大古老文化的深厚根基,得到充分发展,对后世的影响及持续的时间,大大超过了印度



佛教。由于这个原因,佛教的重心在中国。佛教成为“中国佛教”,大致经过了四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汉到东晋,是介绍时期。这一时期的著名僧人大都是译经师,同时也是佛典的宣传者,主要是外国人。由于他们汉语水平不高,故不得不借重于中国助手,在译文中也就必然地掺入中国的传统思想与词汇,这为魏晋“格义”佛教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二个时期是南北朝,是融会时期,主要表现就是“师说”(学派的)出现,当时流行的“师说”有涅槃学、成实学、三论学、地论学、阿毗昙学,禅法也相继流行。总体上,北方重实践,南方重义理,随着融合的不断深入,这些师说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建立做了资料与理论上的准备。从大的方面看,这一时期佛教的融合也是当时民族融合、思想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被称为中国佛教“大纲”的《大乘起信论》,隋唐时期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无一不依《大乘起信论》建立其主张。

第三个时期是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创造阶段,表现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宗派的建立,主要宗派有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尤其是禅宗的创立,真正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后世说“中国佛教”指的就是禅宗。

第四个时期从宋至清,是诸宗融会归于净土的固定化时期。此时,受儒学影响,佛教一方面强调儒佛合流,三教一致,主张世间与出世间的“不二”,从而具有世俗化、近代化的因素;另一方面教内也展开融合,先后出现禅宗独盛局面、禅净合一思潮,以至于诸宗归净土。这个时期的最终表现即是以晚明“四大高僧”为代表的调和论和以四大名山为代表的“名山佛教”。名山佛教是中国古代佛教的定型。

在这四个时期里,都有安徽名僧的声音,如第一个时期中的严佛调。第二个时期中的僧导;第三个时期中,安徽更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禅宗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璨均在法难之时避居安徽的山林之地,保存了禅宗的火种;宋僧大慧宗杲从时代需求出发,发展出看话禅,创造性地提出菩提心即忠义心,充分地显示出僧家的爱国情怀。第四个时期中,晚明四大

高僧之一的慧思德清力主三教调和、禅教净相调和,代表中国佛教圆熟时期的主流意见;九华山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定型形态,至今仍具有世界性的影响。这是安徽佛教文化的伟大贡献,我们有必要予以历史的回顾,汲取其中的精华,为安徽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资粮。

再说道教。自东汉时皖人张陵创立道教以来,也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是创立和改造阶段。张陵创五斗米道,张角创太平道。东汉末年,太平道发动起义,失败后太平道也销声匿迹;五斗米道虽在北方得以传播,但陷入组织涣散、思想混乱的困境。道教遂渐渐发生分化,一部分向上层发展,一部分对民间道教进行改造。东晋葛洪著《抱朴子》,构建了一套成仙的理论体系,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以儒术应世为外的修炼原则,为上层化的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民间仍然传播着通俗形式的道教。对民间道教的成功改造是在南北朝时,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代张陵为天师,被称为“北天师道”;刘宋庐山道士陆修静则“祖述三张,弘衍二葛(葛玄、葛洪)”,搜罗经诀,总括三洞,又广制斋戒仪范以改革五斗米道,被称为“南天师道”。在此基础上,陶弘景构造神仙谱系,继续吸收儒、释思想,主张三教合流。经过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的改造之后,民间性的道教基本上转化为上层的士族贵族宗教。

第二个阶段从隋唐到北宋,是道教的兴盛和发展阶段。主要原因在于唐宋经济的繁荣以及国家的统一,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唐宋统治者都尊崇道教,唐代统治者自称老子后裔,抬高了道教的地位;宋代统治者也崇道,如宋真宗与宋徽宗都是好道的皇帝。他们还大力提倡研究道书,如设立道举制度,把《老子》《庄子》等作为“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又搜集整理道书并颁行天下。由此,道书造作益多,习道之风日盛,出现了一大批道教思想家,如孙思邈、成玄英、司马承祯、杜光庭、陈抟、张伯端等。隋唐时,道教外丹方术特别盛行,但由于多有服丹致死者,此后便转向内丹之学,张伯端的《悟真篇》是对这一阶段内丹学的理论总

结,为南宋的金丹道派继承和发展。

第三个阶段从南宋到明中叶,是道教宗派兴起和继续发展的阶段。南宋偏安,民族矛盾尖锐,道教内部也随之宗派竞起。在南方,除旧有的龙虎天师、茅山上清、阁皂灵宝等三山符箓派外,还有神霄派、清微派、天心正法派、东华派、净明派、金丹派南宗等;在北方则有王重阳的全真道、萧抱珍的太一道、利德仁的大道教(后改称真大道教),但只有全真道由于受元朝廷的支持而久传不衰。天师道为了与之相抗衡,和上清、灵宝、净明等符箓派逐渐合流,至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被授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符箓各派于是统一为正一派。明代特重正一派,世宗尤甚,以致政局受其左右。

第四个阶段从明中叶到晚清,是道教的衰落阶段。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封建社会步入穷途,道教亦随之衰落。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失去了统治者的支持,地位逐步下降。入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尚能沿用明朝例对道教加以保护以笼络人心,但到乾隆时,则对道教一再贬抑,禁止正一真人差遣法员传度,限制天师率领本山道众。道教不可避免地步入末路。

从上述中国佛道宗教发展概况看,借用佛教语言来说,都经历了“成、住、坏”的过程,成则差不多同时起步,至南北朝时均已具备一定的规模。住的阶段,则佛教发展相对早些,如宋代就有佛教大藏经的刻印,完整的道藏则迟在明正统年间。佛教自入宋之后即进入十分繁荣的时期,两宋之际大慧宗杲的看话禅再创中国佛教发展之高峰;道教稍缓,但也成就斐然,唐宋时期大家辈出,外丹内丹之学都相继成熟,至元代真正的宗派也宣告成立;从三教关系来说,明代之前,佛、道二教所主张三教同源一致之说在理论内容上也基本一致,说明了三教关系论至此也收获成熟的主张。入明以来,由于朱氏皇帝佛道政策的限制以及三教之间相互的影响与交融,佛教归于净土一门,主张三教的调和,理论上不再有创新;道教则因几代皇帝的宠爱,正一派获得发展的空间,但总体上也未见理论的新进展。就安徽道教来说,其中值得提出的人物似只有陈抟,他

是道教唐宋兴盛期的创造者与见证者；元代折中儒道的杜道坚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与前述安徽佛教的情况比较起来，尚有很大差距。

作为《安徽文化精要》丛书的一种，本书遵循丛书“突出本土文化”的指导精神，基于我们对安徽宗教历史的认知，本书的关注重点是安徽的佛教与道教，尤其是佛教文化方面。我们这样安排，主要是因为佛教与道教在安徽的发展并不相埒。前述中国佛道宗教发展时也提到，我们还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其一，历史人物方面。《安徽省志·民族宗教志》（1999年版）所附《安徽佛门龙象传》记载，安徽历史上比较活跃、颇有造诣的各宗各类高僧情况是：义学高僧9人，禅宗高僧44人，律宗高僧10人，净土宗13人，以苦行见长的高僧13人，以神异著称的高僧16人，以兴福名世的高僧10人，可见历史人物众多，以禅宗为最；而《民族宗教志》所载安徽道教人物只有老子、庄子、乐长子、左慈、白鹤道人、商栖霞、赵知微、闻丘方远、聂师道、陈抟、丁少微、赵自然、李斯立、贺士迪、张松谷、张古山、邈遏仙、沈鼎彦、梁本惠、陆合宽、陈撄宁等21人，不及安徽禅宗高僧数的二分之一。尽管有遗漏（如元代杜道坚未列入），但思想家偏少却是事实。其中，前三位是东汉之前的人，属于道教前史人物；后18位当中，从所列名字看，至少“白鹤道人”与“邈遏仙”连姓名都没有记载（这与道教的特点有关），更不要说著述了；从这些道教人物在中国道教思想史中的地位看，东汉以后的人物中，除陈抟与陈撄宁外，其他人物的思想影响不大。其二，文化遗存方面。1983年国务院发布的60号文件确定了汉族地区佛道教全国重点寺观，安徽有14座佛教寺院入选，但没有一座道教官观入选。1984年12月30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确定佛道教省级重点寺观的皖政〔1984〕147号文件，其中，佛教寺院有52座，道教官观只有3座。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则多写，少则略写，无则不写，以期呈现出安徽宗教的历史真实。结合安徽宗教的实情，我们将它的历史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成长期，从两汉到南北朝。这一时期就佛教而言，是





一个从传入到学派师说林立的发展过程,其初,楚王刘英将佛教带入安徽,彭城笮融的事佛活动推动了佛教在安徽民间的传播;临淮严佛调正式出家,参与译事,从事著述,则是佛学义学的开端。只有义学在发展,我们才有可能讨论中国的佛教,因此我们说这是中国的佛教的开端。在“师说”(学派)中,安徽佛教产生了中国佛教传播的重镇——寿春,出现了弘扬《十诵律》和成实学的师说,与其他师说一起构成南北朝佛教的主要内容。

第二个时期为繁荣期,从唐至宋的时期。安徽佛教的繁荣体现在禅宗与净土宗上。禅宗这一时期于安徽孕育,慧可、僧璨隐居于安徽山林,门下道信创立了“东山法门”,而慧能禅宗正是接着“东山法门”而来的;此后可以说是大匠辈出,司空本净禅师在禅宗还没有取得正统地位时率先来到北宗禅的大本营——长安,与诸禅师坐而论道;马祖门下“超然物外”的南泉普愿居池州南泉山三十多年,以当地风物入禅,更以“斩猫”公案开示学人,可谓惊世骇俗,门弟子赵州以“吃茶去”而闻名,在当代居士赵朴初先生身上亦有体现;黄檗希运因与大护法裴休的殊胜因缘于宛陵弘法,有《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行世,更是以无心无求与见性成佛的禅学思想和大机大用的禅风启发了义玄的禅学,创立了最具中国化特色的临济宗。宋代,白云禅师终老于太湖四面山,其弟子五祖法演得法后住持慧能得法的黄梅寺,真正是报祖师恩德之举;枞阳浮山的法远禅师受大阳之托,代为寻找振兴曹洞宗的传人,法远乃嘱其弟子投子山义青传曹洞宗风,也是禅宗史上的一段佳话;宁国人大慧宗杲与和州人虎丘绍隆各阐一方,形成临济宗大慧派与虎丘派,成为以后中国禅宗的主流。净土宗经由善导与王日休的发挥,分别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大大地推动了净土宗的发展。唐宋时期的道教,由于李唐统治者自称老子后裔,道教在唐代得到比较高的地位与比较优越的发展环境,组织得以兴盛,教义、科仪、经典得到整理与编纂,教理获得大发展;由于唐武宗的废佛与五代周世宗的“扬道抑佛”政策,因而在动乱的唐末五代,道教仍处于发展期;北宋继续推行扶持和崇奉道教的政策,道教仍在向前推进,但

因安史之乱后中国封建社会转盛为衰,过分依赖政权的道教也只能缓慢进步。加之外丹实践的负面影响(有时没效果甚至起反作用)以及禅宗心性之学的流行,道教也转向内丹心性学,南宋时的全真道是其积极的成果。就安徽道教而言,出现了两个著名道士,一个是舒州人闾丘方远,作有《太平经钞》;一个是亳州人陈抟,作先天太极图,由外丹转向内丹,并直接促成了理学宗师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问世。但与同时期的安徽佛教相比还是逊色不少。

第三个时期为圆熟期,是元明清时期。从整个中国宗教的情况看,元明清时期是在走下坡路,一没有开放性的宗教政策,二没有开创性的理论建树,即使是对三教关系的认识方面,也只是在前贤预设的范围内展开。明末“四大高僧”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中国佛教最值得后人称道的地方,但他们都是调和论者,并无理论创新,且影响主要在于社会现实方面。这表明,在传统社会中,传统宗教已无再上新台阶的可能,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社会需要的是单纯的、信仰性的宗教,佛教道教“四大名山”的出现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因为佛教道教“四大名山”安徽各占其一(佛教名山九华山与道教名山齐云山),我们说安徽佛道宗教完全可以代表元明清时期中国佛道宗教发展的一般情况,因此对于安徽地域来说,这一时期无疑可以称作安徽宗教的“圆熟期”。这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是表明,这一时期安徽佛道宗教以圆融调和的方式发展,从而发展成一种成熟的形态;其二是表明,安徽佛道宗教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调和论与宗教名山成为中国传统宗教发展的最后的理论表达与信仰诉求,标志着中国传统宗教的定型。

以后则是佛道宗教的近现代的过程,单从“安徽宗教”这个概念来说,这一时期可以作为第四个时期,但为了区别中国的古代与近现代这两个完全不同质的社会形态,对于这部分内容我们不再以“时期”作为标识。

从以上简单介绍看,我们应该为安徽佛道宗教的历史感到自豪,早期安徽佛教基本上涵盖了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的发展内容,与此同时,皖人张陵远赴西蜀创立道教,改变了尔后中国思想中三教关系的内容;南



北朝时期安徽形成了寿春这一佛教传播重镇；动乱时代，安徽山林地区成为中国禅宗的发祥地；南宗禅名动天下之后，安徽地区也是龙象辈出；至宋代，大慧宗杲的看话禅再创禅宗高峰，与和州的绍隆分别形成大慧派与虎丘派，成为尔后中国禅宗的主流；唐宋之际的陈抟实现了道教的内丹学转向，对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其意义不可低估；明代，凤阳人朱元璋为明清宗教的发展规定了方向，至明末佛教复兴，“四大师”中安徽有其一；明清以后形成的佛道宗教四大名山中，安徽亦各占其一，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安徽佛道宗教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在每一个大的阶段，先述佛教，再述道教，这只是我们的逻辑安排。实际上，佛教与道教在安徽的历史展开过程既是一个自身连续发展的过程，也是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过程。此外，我们还将佛道宗教文化遗存方面的内容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写入本书，这一方面是因为，若将这些文化遗存分别置于前述佛道思想发展的章节中，就会使得本书的条理不够清晰；另一方面，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的确值得我们自豪，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能从实际存在物的角度使我们对安徽佛道宗教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把握。

佛道二教的发展归宿是三教融合，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系统，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并不在这个体系中，至少，这两种宗教的“本土化”来得相当晚，与佛道宗教的发展不是同步的。当然，它们在安徽的传播与发展在安徽近现代化过程中确实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与本丛书强调的“本土文化”尚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安徽的发展另作一章，对这两个宗教及其文化遗存做一介绍。

这里还有必要简单地讨论一下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以佛教为例，中国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重大思想进展，都与安徽有着重要关联：或是皖籍高僧孤明先发，阐明教理，或是外地大德跋山涉水来江淮之地弘传佛法。这构成了安徽佛教的两翼，表明作为一个地域，其思想文化的演进与中华整体文化的发展是互动的。地域文化是总体文

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各地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中华文化的辉煌灿烂。因此,我们探讨安徽宗教,一方面,自然应以本地域宗教思想为重点;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对安徽宗教做一孤立的考察,而应当将其看作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只有在中华文化的总体性视域下,安徽宗教才能呈现出完整的历史文化意义;否则,将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作为传统宗教,佛教道教之成立、成长及发扬光大,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小农经济造成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形态,并决定了它的缓慢演进的特质,形成宗教成长的固定场域,奠定了佛、道宗教并存的基本格局。地域宗教的特色也只能在这既定的时空结构中显示出来。

安徽文化具有浪漫的老庄道家源头,总体上持一种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开拓的而非守成的精神,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体现在宗教上,就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大量具有革新意识的宗教思想家。

近代以来,随着小农经济的衰败、近代工业经济的渐次发展,作为信仰对象的具有传统宗教体制的佛道宗教也不可挽回地失去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存在于佛道宗教中的思想文化精神却能在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过程中发挥自身应有的积极作用,并受近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转型,产生了中国的现代化的佛、道宗教。在佛道教现代化过程中,安徽宗教思想家可谓居功至伟。佛教方面就是以杨仁山居士(安徽石台人)开其端、赵朴初居士(安徽太湖人)殿其后的佛教现代化进程,以“人间佛教”理念的提出与实践为最终成果。道教方面就是陈撄宁(安徽怀宁人)在总结、批判旧学基础上提出的“仙学”及其实践。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梳理,可以为当今和谐安徽建设中的文化建构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源。

本书由余秉颐、杨国平、殷玉楼三人合作完成。我们在商定写作任务之后,首先以“条目”的形式由各个人完成自己的写作内容,再由杨国平按原计划的框架整理成书稿,由余秉颐最终审阅并定稿。



分工写作的基本情况是：余秉颐撰写第三部分中的“富于世间化色彩的九华山佛教”；殷玉楼撰写本书道教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部分中的“被不断神化的老子：道教产生的信仰标志”“道教的创立及在魏晋的发展”，第二部分中“唐宋时期的安徽道教”的“唐代安徽名道闻丘方远”“陈抟：由外丹转向内丹”，第三部分的“元代安徽道教”，第四部分的“道教的现代转折：陈撄宁与‘仙学’”；其余由杨国平撰写。

余秉颐作为本书的主编，在本书内容安排、框架设计、最终审阅定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三位作者中，余秉颐先生是前辈学者，资深研究员，杨国平与殷玉楼是年轻的高校教师。在全书写作、完善、成书的过程中，两位年轻作者都真切感受到前辈学者的睿智、风范以及提携后学之殷切，这里特地拈出，以表达两位年轻人对前辈的感激与敬意。杨国平与殷玉楼同供职于安徽大学哲学系，二人撰写的内容同时获得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中国哲学重点学科、安徽思想家研究创新团队的项目资助与支持，谨致谢忱。本书作为《安徽文化精要》丛书的一种，从筹划到完稿，都得到丛书总编陆勤毅先生的关怀与指导；省社科院当代安徽研究所沈葵先生通阅全稿并提出很多宝贵意见，本书的完善得益于沈先生良多；安徽文艺出版社领导及责任编辑张磊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辛苦的劳动，为本书增色不少。在此一并表达我们的诚挚谢意！

由于作者学识不足，阅历有限，加之所掌握的资料亦不够，把握历史的能力也很欠缺，书中疏漏与浅薄之处在所难免；尽管我们力求做到通俗，但因本丛书强调的“文化”以及作者文字习惯的不同，书中难免出现一些学术性的探讨，也难免有行文风格不一致的地方，这些都是需要方家指正的。我们写作本书还有一个真诚的愿望，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安徽宗教，研究安徽宗教，如果本书真的可以起到抛砖引玉之用，那将令我们倍感欣慰！

杨国平

2014年8月于合肥

目 录

总 序(陆勤毅)	001
引 言	001
一、安徽佛道宗教的成长(两汉至南北朝)	
——从起始到具备规模	
1. 佛教在安徽的早期传播	001
楚王刘英“尚浮屠之仁祠”	001
笮融的崇佛活动及其对佛教传播的影响	004
汉地第一僧人严佛调	006
2. “师说”时期的安徽佛教:卑摩罗叉与僧导	009
卑摩罗叉与《十诵律》的弘传	009
僧导与《成实论》寿春系	013
3. 被不断神化的老子:道教产生的信仰标志	018
从楚王英喜黄老到《老子铭》	018
《老子想尔注》与老子的道教化	020
《老子道德经序诀》与《西升经》	023
4. 道教的创立及在魏晋的发展	024
张陵创教	024
张鲁嗣教	027
曹操与五斗米道	028
葛玄之师左慈	031